

新形势下辽宁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研究

何 林¹ 郭艳娇²

(1.锦州医科大学,辽宁 121002;2.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沈阳 110032)

内容提要:面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挑战和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党中央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作为一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省域区域经济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息息相关,与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也密切相关。本文全面梳理了2005年以来辽宁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演进和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出台的财政政策,并从辽宁区域经济十年发展结果反思区域发展战略和现有政策不足,结合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要求,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为进一步完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参照。

关键词:省域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 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0)11-0096-09

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空间格局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国家长三角、京津冀和“一带一路”大的发展战略背景下,省域区域经济如何协调、协同发展同样重要。省域区域经济发展也离不开政策支持,特别是财政政策支持。财政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有两个出发点,一是针对问题区域,重在帮扶,二是追求资源空间配置效率,重在促进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通过合作而不是竞争打破行政障碍,追求并实现1+1>2的共赢结果。实践中,两个出发点引发的财政政策交织在一起,常常发生以公平目标探讨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导致政策的摇摆不定。新时代新发展格局

背景下,公平和效率的取舍进一步弱化,如何做到两者兼顾成为时代主题,且重心是国内循环,这对财政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和考虑,本文以辽宁样本为例,分析省域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财政支持政策绩效,并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战略提出的新要求,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一、辽宁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及成效

(一)辽宁区域发展战略历程

1.第一阶段:中央主导、以辽宁中部城市群为主

[收稿日期]2020-08-20

[作者简介]何林,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郭艳娇,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财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北经济运行负向传导机理及政府策略选择研究”阶段性成果(19BJY220);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PPP模式下辽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研究(L16AJY013)”;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地方教育财政、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WJC202019)”。

时期。辽宁区域发展战略最早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50—60 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快经济和国防发展,中央主导重点建设了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包括沈阳、鞍山、抚顺、辽阳、本溪和铁岭),使其成为当时国内最先建成的、最大的重化工业基地。

2. 第二阶段:发展重点向沿海转移并兼顾造血式帮扶时期。2003 年国家推行东北振兴战略,辽宁积极响应,于 2005 年提出“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和“三点一线发展战略”,2006 年“三点一线发展战略”拓展成“五点一线发展战略”。区域发展重点从中部城市群向沿海各市拓展。2007 年提出推进沈阳与抚顺的同城化发展,使城际连接带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突破口。2008 年提出“突破辽西北”发展战略,通过举全省之力,加大对辽西北地区支持力度,提高内生动力,增强“造血”机能,促进辽西北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同年,“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将阜新纳入并更名为“沈阳经济区”,“五点一线发展战略”将营口和朝阳纳入并更名为“辽宁沿海经济带”。辽宁区域发展自此开始兼顾贫困地区,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帮扶。

3. 第三阶段:转向改革引领、创新引领、开放引领和功能区引领的过渡时期。2017 年辽宁调整了三大区域的经济地理范围,调整后的沈阳经济区范围确定为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辽阳共 5 个城市。辽宁沿海经济带范围确定为大连、盘锦、锦州、营口、葫芦岛和丹东共 6 个城市,突破辽西北范围确定为朝阳、阜新和铁岭 3 个城市。制定了三大区域发展的三年攻坚计划,对内实施机制体制改革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对外加强与国际、省际和市际间的合作,软硬环境建设齐头并进。此后,辽宁逐渐形成了“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突破辽西北、县域经济和沈抚新区”五大区域发展战略格局。2019 年 8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2019 年 12 月 16 日辽宁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对区域发

展也提出了新要求:“顺应经济调整 and 产业发展新趋势,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发挥沈阳、大连的龙头作用,促进各类要素向沈阳、大连集聚,进一步提升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大力支持辽西北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加强生态环保治理。”

2020 年 11 月 27 日通过的《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制定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辽宁区域发展做出了崭新的部署。提出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加快建设以沈阳为中心的现代化都市圈,以大连为龙头深入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建设辽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和辽东绿色经济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全国来看,改革开放后实施的是向东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2019 年再次明确为以功能区为引领,优先培育增长极,并通过增长极扩散带动整个区域实现高水平、高效率的发展。从地区来看,以广东为例,也始终以珠三角地区为核心,使强者更强,进而由强带弱,实现区域发展和协调并进。安徽近年的崛起也得益于“合而肥之”的区域发展战略。很显然,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和规划时,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简单地推行均衡发展。

(二)辽宁区域经济发展成效

从发展结果看,作为初始增长极的沈阳经济区对辽宁贡献下降明显,特别是在经济总量(见图 1)、利用外资(见图 2)等方面;沿海经济带对辽宁贡献虽有所增加,但更多体现的是相对贡献,不能弥补和替代沈阳经济区;辽西北地区无论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看赶超效果不明显。在三大区域内部,沈阳、大连的增长极效应也在不断弱化,辐射带动作用有限。

从发展潜力看,三大区域二三产业合计占比下降,第二产业占比下降明显(见图 3),其中,辽西北地区下降 19.1 个百分点,沈阳经济区下降 13.8 个百分点,沿海经济带下降 12.7 个百分点,经济结构调整未呈现明显的工业化、服务业化态势。

三大区域的出口额和利用外资呈先上升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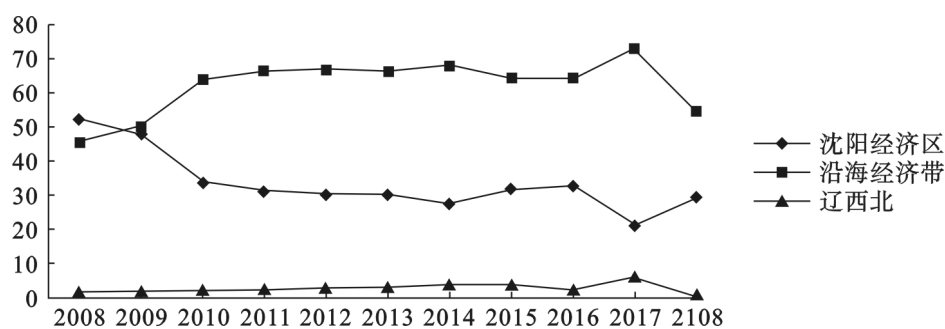


图1 三大区域 GDP 对全省的贡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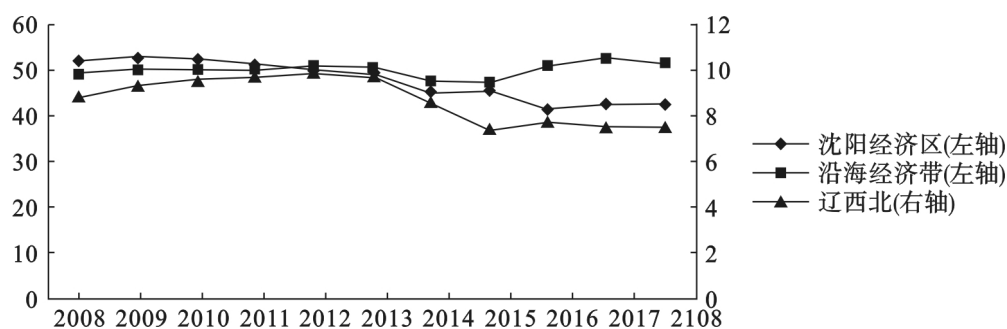


图2 三大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全省的贡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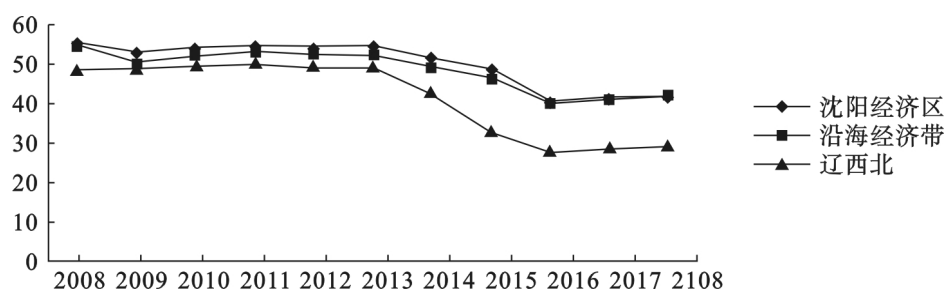


图3 三大区域第二产业占比 (%)

表1 三大区域出口额及其占全省的比重

单位:亿元、%

年份	全省	沈阳经济区		沿海经济带		辽西北地区	
		绝对值	占比	绝对值	占比	绝对值	占比
2008	420.5	114.0	27.1	300.5	71.5	6.1	1.4
2009	334.4	65.4	19.5	260.1	77.8	9.0	2.7
2010	431.2	85.9	19.9	335.4	77.8	9.9	2.3
2011	225.1	99.0	44.0	116.2	51.6	10.0	4.4
2012	579.5	120.5	20.8	448.5	77.4	10.5	1.8
2013	645.5	149.3	23.1	482.1	74.7	14.1	2.2
2014	573.8	142.8	24.9	413.4	72.0	17.6	3.1
2015	501.6	127.8	25.5	358.3	71.4	15.5	3.1
2016	530.7	91.1	17.2	429.7	81.0	9.9	1.9
2017	448.8	102.0	22.7	338.0	75.3	8.9	2.0
2018	487.9	112.3	23.0	365.3	74.9	10.3	2.1
年均增长率	1.5	-0.2	-	2.0	-	5.4	-

注:年均增长率按现价法计算。三大区域数据为2017年调整后的所包含地级市的数据之和。

降趋势,以 2013 年为分水岭。其中,2018 年出口额止跌回升,基本与 2008 年状态持平,可以称其为“失去的十年”(见表 1)。而外商直接投资至 2018 年仍然呈下降趋势,年均降幅达 8.6%。三大区域看,只有沿海经济带相对好一些,降幅在 10%以内。从对全省贡献(以占全省比重表示)看,沈阳经济区的出

口额和利用外资下降都比较明显,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下降了近一半,从 2008 年的 52.5%下降到 2018 年 29.2%(见表 2)。出口和利用外资的双重下降,短期内制约辽宁的总需求水平,长期通过影响资本形成速度和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三大区域经济增长,不容小觑。

表 2 三大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占全省的比重

单位:亿元、%

年份	全省	沈阳经济区		沿海经济带		辽西北	
		绝对值	占比	绝对值	占比	绝对值	占比
2008	120.2	63.1	52.5	54.9	45.6	2.2	1.8
2009	154.4	73.8	47.8	77.5	50.2	3.1	2.0
2010	207.5	70.4	33.9	132.3	63.8	4.8	2.3
2011	242.7	75.6	31.1	161.2	66.4	6.0	2.5
2012	267.9	81.2	30.3	179.1	66.8	7.7	2.9
2013	290.4	87.5	30.1	193.2	66.5	9.7	3.3
2014	274.2	76.1	27.8	187.0	68.2	10.6	3.9
2015	51.9	16.5	31.8	33.4	64.5	2.0	3.8
2016	30.0	9.9	32.9	19.4	64.6	0.7	2.4
2017	53.4	11.3	21.2	38.9	72.9	3.2	5.9
2018	49.0	14.3	29.2	26.8	54.7	0.4	0.8
年均增长率	-8.6	-13.8	-	-6.9	-	-15.5	-

注:年均增长率按现价法计算。三大区域数据为 2017 年调整后的所包含地级市的数据之和。

三大区域的财政自生能力均没有向好态势(见图 4),其中,辽西北地区从 2008 年的 35.8%下降为 2018 年的 25.7%,沿海经济带从 66.7%下降到 56.9%,均在 10 个百分点左右。沈阳经济区相对好

些,仅下降 2.3 个百分点。这种变化可能表明辽宁区域政策以“胡萝卜政策”为主,容易引发受援助较多地区对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未能有效培育财政自生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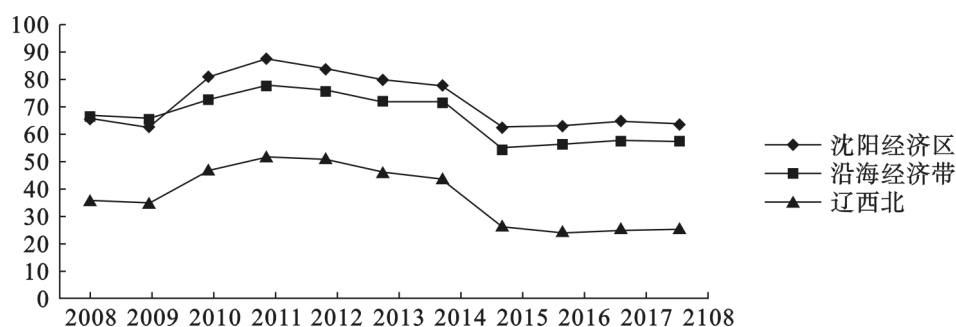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区域财政自给率 (%)

二、辽宁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分析

(一)总量分析

本文查阅了 2005 年以来辽宁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文件,得到 27 项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并将这些政策按照有资金支持和无资金支持、普惠性(所有地区均享有)和针对性(部分地区享有)两个维度

划分成四种情况,即有资金支持的普惠性政策、有资金支持的针对性政策、无资金支持的普惠性政策和无资金支持的针对性政策四种(见表 3)。其中,支持度最高的是有资金支持的针对性政策,从表 3 可以发现,其政策数量也最多,表明辽宁财政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有一定投入。但支持度最低的无资金支持的普惠性政策占比为 30%,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辽宁财政支持区域经济发展还有一定提升空间。

表 3 省级以上财政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矩阵

政策类型	有资金支持	无资金支持
针对性	1.税收定比增量返还政策 2.中央财力性专项补助资金 3.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补助 4.现代服务业发展资金 5.企业技术改造贴息 6.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 7.基本建设基金 8.专项基金 9.专项教育补助 10.现代畜牧业生产基地发展基金 11.现代农业示范点基金 12.固定资产投资补助 13.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补助 14.取消专项上解资金 15.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补助	1.用好省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2.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争取更多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和政策,加强政策指导
普惠性	1.产业项目贴息 2.专项奖励资金	1.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 2.用好各类基金 3.完善财政体制 4.人才政策 5.贯彻落实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财税优惠措施 6.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推进税制改革 7.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财政事权 8.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二)三大区域分析

1.沈阳经济区。沈阳经济区脱胎于辽宁中部城市群,是当时国内最先建成的、最大的重化工业基地,也是辽宁经济发展基础比较好的地区。2010年4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沈阳经济区为国家

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5年以来,支持沈阳经济区的11个政策中,支持度最低的无资金支持的普惠性政策占比55%,支持度最高的有资金支持的针对性政策仅有1项,持续时间为1年,占全省支持区域发展的资金比重为5.5%,且仅沈阳享有。

表4 省级以上财政支持沈阳经济区发展的政策矩阵

政策类型	有资金支持	无资金支持
针对性	1.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补助	1.用好省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2.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争取更多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和政策,加强政策指导
普惠性	1.产业项目贴息 2.专项奖励资金	1.贯彻落实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财税优惠措施 2.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推进税制改革 3.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财政事权 4.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5.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 6.用好各类基金

2.沿海经济带。2005年,时任省委书记李克强重视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三点一线发展战略”,布局辽宁区域发展重点从中部城市群向沿海各市拓展。2006年拓展成“五点一线”,2009年上升为国家战略,致力将其建成我国沿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

并更名为沿海经济带。2005年以来,支持沿海经济带的6个政策中,支持度最低的无资金支持的普惠性政策占比1/3,与支持度最高的有资金支持的针对性政策占比相同,不过沿海经济带有资金支持的针对性政策89%来自中央财力性补助资金。

表5 省级以上财政支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政策矩阵

政策类型	有资金支持	无资金支持
针对性	1.税收定比增量返还政策 2.中央财力性专项补助资金	-
普惠性	1.产业项目贴息 2.专项奖励资金	1.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 2.用好各类基金

3.辽西北地区。辽西北地区是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区位条件不好,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突出。从表6可以看出,2005年以来,辽西北地区获得的支持度最高的有资

金支持的针对性政策在三大区域中居于首位,共11项,占有资金支持的针对性政策的比重为73.3%,且全部来源于省级资金。

表 6 省级以上财政支持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矩阵

政策类型	有资金支持	无资金支持
针对性	1.现代服务业发展资金 2.企业技术改造贴息 3.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 3.基本建设基金 4.专项基金 5.专项教育补助 6.现代畜牧业生产基地发展基金 7.现代农业示范点基金 8.固定资产投资补助 9.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补助 10.取消专项上解资金 11.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补助	-
普惠性	1.产业项目贴息 2.专项奖励资金	1.完善财政体制 2.人才政策 3.用好各类基金

(三) 辽宁财政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 以促均衡、补短板、复生态等“输血”方式为主,“造血”功能发挥不足。辽宁三大区域中,前期发展基础最好的区域是脱胎于辽宁中部城市群的沈阳经济区,其次是包含大连在内的沿海经济带,最后是生态脆弱、发展基础薄弱的辽西北。但从有资金支持的政策看,辽西北地区获得最多,其次是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排在最后。同时按照地市平

均来看,省财政对辽西北转移支付也明显高于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带(见图 3)。这种对前期发展基础较好的沈阳经济区投入不足的政策导向,不符合比较优势,必将影响财政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率。而辽西北地区财政自给率从 2008 年的 35.8%下降为 2018 年的 25.7%,沿海经济带从 66.7%下降到 56.9%,沈阳经济区各项指标及对全省贡献下滑,进一步佐证了财政支持区域发展的“造血”功能发挥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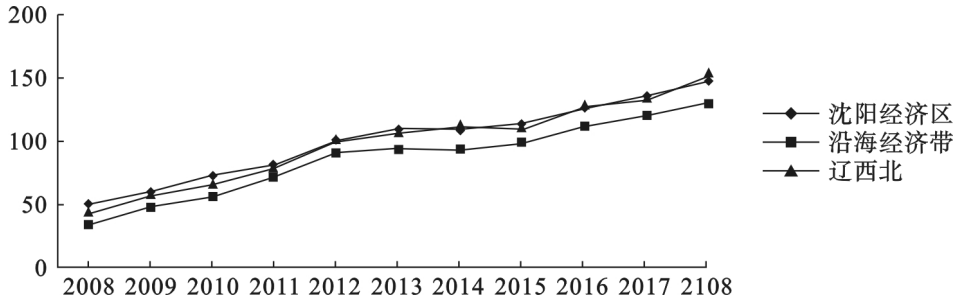


图 5 2008 年 -2018 年按地市平均的省对区域转移支付

2. 支持产业、人才和研发的政策偏少、比重偏低。目前基本达成共识的是老工业基地能否实现振兴的主要因素已经从自然资源(包括基础设施)变

为产业、劳动力、研发和营商环境等。而省以上财政支持资金中,沿海经济带 55.3%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沈阳经济区 71.4%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辽西北

53.5%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针对人才、研发投入和营商环境的政策举措近些年才开始得到重视。以全省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为例,从2008年到2017年,占GDP比重仅从1.1%上升为1.8%。同时,规上工业企业科技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升反降,从2008年的1.6%下降到2015年的1.25%,进一步反映了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内在激励不足。其结果是辽宁产业园区的财政贡献度普遍偏低,最高为沈阳市的46%,大连次之为41%,远低于苏州的73%。县级产业园区的财政贡献更低,例如康平经济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占康平县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93%。有些园区连债务利息都不足以偿付,更谈不上偿还本金了。

3.财政政策与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协同发展有待提高。各市产业布局顶层设计不足,区域内存在同质化恶性竞争。例如大连、盘锦、锦州、抚顺、辽阳等城市都将石化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均建有石化基地,不仅产业趋同,且没有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产品以成品油为主,燃料型中低端产品多,下游高附加值精细化工型产品少,严重影响企业效益和竞争力。再如大石桥、海城镁产品加工产业,紧紧相邻的两市由于同质竞争,缺乏协同,导致人为增加壁垒障碍,制约产业做强做大。相应的,财政支持政策也和区域产业布局相脱节,呈现面广量小问题,未形成合力。

4.区域政策创新和改革相对滞后,撬动社会资本效果不佳。从全国角度看,国家在辽宁设立的各个“区”均是在第二批、第三批之后,例如沈阳经济区获批的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全国的第八批;沿海经济带也是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带之后,辽宁自贸区为第二批,享受的政策红利相对少。从辽宁自己出台的相关政策看,手段相对单一,主要包括产业项目贴息、专项补助、

奖补政策、争取中央资金以及用好各类基金(包括国家级基金、省级基金等)等五大类。而近年来,公私合作、财政金融工具融合支持区域发展等创新举措不断涌现,辽宁虽然也成立了相关机构、出台相应政策、进行了相关业务宣传和培训,但实际落地较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力度不足。

三、新形势下财政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新形势提出新要求

1.新形势下省域区域经济发展由部门间分工向产业链供应链分工转化,相应的财政政策应着力支持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建设。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从大的行业来看,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将日益提高,区域结构趋同将不可避免(魏后凯,2005),地区间产业分工逐步发展为产业链分工。在这种新型分工格局下,省域区域经济发展要将产业链供应链作为一条主线,提高经济协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产业链快速延伸,更有韧性,使供应链更加稳定、多元。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区域产业政策协同,进一步强化产业布局省级统筹,着力解决同域同质化问题,推进地区间良性竞争合作。产业引导基金在支持相关项目发展时,进一步加强和我省产业规划的有机衔接。

2.新形势下省域区域经济发展应兼顾公平与效率,相应的财政政策应制定差异化政策目标和措施。一般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均衡-非均衡-协调三个阶段(肖春梅,孙久文,叶振宇,2010)。其中,均衡侧重公平,以改革开放前的“工业西渐”为代表,目的是改变旧中国工业分布极端不平衡的现状。非均衡侧重效率,改革开放后由广东、福建加14个沿海城市优先发展逐步拓展成以沿海地区乡镇企业为主力,“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为代表,梯度布局,纵向发展经济。而新发展格局下的协调发展以效率为引领,以公平为

基础,突出区域功能定位,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这要求财政政策制定差异化发展目标,促进中心城市在要素集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而其他地区则在环境保护、粮食安全、国防安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 新形势下省域区域经济发展聚焦国内市场,相应的财政政策应以提振国内消费着力点。双循环中聚焦国内市场与过去强调的扩大内需有本质区别,当下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要以刺激居民消费为主导,需要制度供给实现结构性改革,释放长期发展红利(董志勇,李成明,2020)。这就要求财政在收入分配调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市场制度建设和创新驱动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从供求两端改善居民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

(二)对策建议

1. 呼吁顶层设计,规划为先。一是加大对沈阳、大连和辽中南城市群的支持力度,提升这些城市和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带动作用;二是增进并支持区域内产业协同发展、区域间产业差异化发展。

2. 聚焦创新驱动,产业协同。一是优化整合省科技专项资金,对标先进省份做法,改革财政体制机制,提高有效支持区域创新发展的工具和做法的落地率,完善和推进各类平台建设,提升财政政策带动全社会创新发展的绩效水平;二是加强省级人才专项资金整合力度,优化省级人才专项资金支持方向,在优化人才引进政策的同时关注现有人才需求,有针对性的出台精准政策留住人才、加大现有人才培育,遏制人才外流;三是用好用足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资金和三链融合省级专项资金,围绕辽宁关键行业、关键企业、关键产品,支持区域构建特色产业链,延伸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提升,降低同质化竞争率。

3. 完善制度供给,刺激消费。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收入分配调节,相对于征税等二次分配政

策,机会平等和劳动收入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上升更为重要。建议,一是加大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加大落后地区教育投入力度,重点“扶志”和“扶智”,扩大消费群体;二是进一步深化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向消费社会转型;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兜住民生、生态底线。

4. 坚持市场主导,整体推进。一是打破传统专项资金分配方式,转“输血”为“造血”,优化引导基金运作、规范推进 PPP、加大各类融资担保扶持力度、加快担保再担保体系建设、推动政策性保险试点;二是整合各类资金,形成合力,着重支持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实现重点突破,以点带面;三是支持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解决历史包袱;四是优化营商环境,着力降低制度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激活中小企业活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可云. 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基础与欧盟国家实践[M].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1.
- [2] 陈鸿宇. 后工业化时期产业和人口的双重再集聚——英国区域政策变化趋势及其对广东的启示[J]. 岭南学刊, 2009(1): 62-67.
- [3] 魏后凯. 当前优化区域竞争中的几个误区[J]. 中州学刊, 2005(3): 23-26.
- [4] 董志勇, 李成明.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历史溯源、逻辑阐释与政策导向[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0(5): 47-55.
- [5] 课题组. 粤鲁皖三省区域协调发展实践及对辽宁财政的启示[J]. 地方财政研究, 2020(5): 48-58.
- [6] 黄群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未来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和着力点[J]. 财经界, 2020(10): 11-12.
- [7] 李小玉, 卢小祁, 薛飞, 陶虹佼. “双循环”背景下居民新兴消费培育策略——以江西为研究案例[J]. 企业经济, 2020(11): 131-138.
- [8] 董志勇, 陈丹. 准确理解双循环战略新理念[J]. 债券, 2020(9): 16-21.

【责任编辑 陆成林】